

一 开始

印度的政治分立造成了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无论是此前还是以后，都没有如此多的人如此迅速地相互交换家园和祖国。在短短几个月间，大约一千二百万人在被砍去一截的新印度和新成立的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之间迁徙移动。这批难民中迄今为止最庞大的部分——人数超过一千万——越过划分历史上旁遮普的西部边界，穆斯林们迁往西面的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们迁往东面的印度。屠杀有时伴随、有时则促成了他们的迁移；还有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估计死亡人数在二十万（当时英国的数字）到二百万（事后印度的估计）之间，而如今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死亡人数大约是一千万左右。当时，正如任何时候一样，到处都有性暴力行为：约有七万五千妇女遭到不同宗教信仰的男人的劫持和强奸（有时甚至被同信仰的男人强暴）。成千上万的夫妻妻离子散，家园被毁，庄稼在地里腐烂，村庄被遗弃。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警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政府对这场灾难仍然措手不及：他们没有预料到按宗教信仰不同——这么多的印度教徒对这么多的穆斯林——划分边界会造成这么大的恐慌和骚乱，会迫使人们逃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处于同类人中间。人们开着小车，乘着公共汽车、火车，但大多数人步行，大批徒步迁徙的人群被称为“卡非拉”（kafila），他们延绵不绝，几十英里望不到头。据说最长的一支队伍里有将近四十万人，难民们从旁

遮普西部向西迁往印度，这支最长的队伍在这条路线上的每个特定地点都要花整整八天时间才能过完。

这就是印巴分治的一般状况：它在历史著作里公开存在着。但具体的细节则不太容易发现；它秘密地存在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千家万户反复讲述的那些故事里。我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我像同时代的许多旁遮普人一样，来自一个分治难民家庭。分治的记忆，当时的恐惧和残酷，以及对从前那种——经常是神话般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和平、和睦共处时代的追忆，这些构成了我成长过程中听到的那些故事的主要内容。我的父母来自拉合尔，这是一个令其居民深爱和感伤落泪的城市，位于巴基斯坦边界以内仅仅二十英里处。我母亲讲述着她两次回去把弟弟妹妹带到印度来的危险旅程。我父亲记得在枪声呼啸、炮火隆隆中逃离拉合尔的情景。我和兄弟姐妹们听着这些故事，并没有深入心里。我们属于中产阶级的印度人，是在一个相对平静和富足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宽容和“非宗教主义”似乎在辩论中占居上风。而这些故事——抢劫、纵火、强奸、杀戮——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它们对我几乎毫无触动。

然后，一九八四年十月，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她的安全警卫刺杀，那两个人都是锡克教徒。在随后的日子里，全印度的锡克教徒都遭到大规模的暴力袭击和报复。许多家庭毁于一旦，成千上万的人无辜丧生。在德里的偏远郊区，有三千多人惨遭杀害，经常是浇上煤油点火焚烧。他们的死状惨不忍睹，令人毛骨悚然。地上的焦黑痕迹显示了他们的尸体躺过的位置。政府——现在由甘地夫人的儿子拉吉夫领导了——保持冷淡漠然的态度，但是有几个市民团体联合起来提供安慰、食物和栖身之地。我当时就是在这些团体中工作的几百人中的一员。每天，当我们分发食物和毛毯，统计死亡和失踪者名单，帮助人们索赔损失时，我们听着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讲述他们的遭遇。经常，那些更为年长的人，他们是一九

四七年作为难民来到德里的，便会回忆起他们以前经历过的一场类似的恐慌。“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们说。“真像是又来了一场印巴分治。”

在这里，在朱木拿河对岸，距离我居住的地方只有几英里处，安分守己的普通百姓被他们的邻居赶出家园，残酷杀害，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就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宗教团体。印巴分治的故事不再显得那样遥远了：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村庄的人们，仍然可以因为其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进行政治划分，而且一旦划分，就可以对彼此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两年后，我为一家英国电视台制作一部有关印巴分治的影片，便开始从分治幸存者那里收集故事。许多故事骇人听闻，如果我年纪更小一些，或是间接地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故事，我会觉得难以置信：妇女为逃避强奸或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而投井自溺；父亲杀死亲生骨肉，使他们免遭同样耻辱的命运。这些故事我是听目击者亲口叙述的，他们的痛苦、愤怒和仇恨——这些一旦爆发出来是令人惊骇的——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事实。

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据我所知，我自己的家庭里从未发生过如此残酷和血淋淋的事情，但是我开始意识到，即使在我的家庭里，印巴分治的历史也并没有结束——它的简单而残忍的政治地理今天仍然影响和分裂着我们。这些分裂存在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所带来的矛盾也无处不在。有多少次，我听见我的父母、我的祖母带着温情和思念，说起他们在拉合尔时的那些穆斯林朋友，又有多少次，我听见他们带着缺乏理性的偏见议论“那些穆斯林”；有多少次，我听见母亲怀着负罪感谈到她那位娶穆斯林为妻的哥哥……到了一九八四年，我终于明白了印巴分治在我们生活中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也认识到它绝不可能被如此简单地收进历史书页，束之高阁。我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人。

像其他所有的研究者一样，我最初做的事情是查阅有关印巴分治方面的文章。资料倒是非常丰富。然而，随着我这样阅读下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满足，有时甚至感到气愤。如果我所读的那些书是可信的，那么印巴分治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此之前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分歧日益严重，真纳和甘地、尼赫鲁、帕特尔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以及“政治”前沿的许多其他变故。伴随着印巴分治和紧随其后的还有一系列事件：暴力行为、大批移民迁徙、难民、恢复重建。但是印巴分治的“历史”似乎只存在于直接导致它的那些政治变故中。至于那些其他方面——经历那个时代的几百万人的境遇如何，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有关“人”的方面“做何评价”等等，它们在这些著作里的地位则相对“较弱”。也许这是因为它们牵涉到另外一些东西：损失和分配、友谊和敌意、忧伤和喜悦、失去家园、祖国和朋友的痛苦悔恨和思乡情结，以及想要重新创造这一切的同样强烈的决心。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实实在在”捕捉到的。然而，它们在印巴分治的历史中真的没有任何地位吗？如果是这样，它们为什么还如此鲜明地存在于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中呢？

我探究着这些历史著作中的庞大政治事实想阐述的思想。如果我理解得不错，那么它仿佛是说印巴分治已经结束，已经过去，已经成为昔日往事。然而，我们周围的现实却完全不同：到处都是印巴分治的影子，到处都是教派冲突的紧张情绪，原教旨主义，以及宗教基础上的越来越大的分歧。一九八四年在德里，锡克教徒成为公众袭击的对象；一九八九年在比哈尔的巴加尔普尔，在印度最严重的一次教派冲突暴乱中，几百名穆斯林被杀；几年后，阿逾陀的巴布里清真寺被疯狂的印度教教族集团分子（得到一些政治团体的公开的、厚颜无耻的支持，如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国际印度教协会和湿婆志愿军），随后，在苏拉特、阿姆达巴德和孟买。

又有几千名穆斯林成为攻击目标。在上面这些事例中，印巴分治的往事和记忆都被侵略者有选择地利用着：好战的印度教徒被动员起来，用的是一种片面的理论，说穆斯林在分治时杀害了印度教徒，强奸了印度教妇女，因此他们必须也被杀害，他们的妇女必须也被强奸。在个人生活中也体现了这样的模式：在独立的印度，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印度教徒不可能轻易结为夫妻，他们总是担心自己或对方能否逃脱家庭或教派的惩罚；这样的婚姻一旦破裂，或因什么原因对簿公堂，肯定同时会出现一批公开声明，宣布——比如在审判员方面——宣布哪些人接受了两国通婚的观点，哪些人没有接受。

这些似乎都强调了印巴分治不可能被轻易淡忘，强调了分治对个人而言的深刻意义，以及那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感，还有它所导致或加强的分歧，所有这些仍然存在于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我开始意识到，印巴分治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划分，或财物、资产和债务的分割。它同时也是，用幸存者反复使用的一句话说，是一种“心灵的分割”。它给在此之前凭借某种社会契约共同生活的教派们带来了折磨、灾难、创伤、痛苦和暴行。它用一条武断确定的，有时甚至是连夜划分的边界拆散了无数家庭，使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是生是死。一对母女在印巴分治的暴行中被拆散，五十年后才通过新闻刊物的媒介找到了对方。当时，为了搜寻一些故事以纪念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着手寻找在分治时被拆散的家庭。一对兄妹在分离半个世纪之后也通过这份刊物在边界重逢。一位父亲的十三岁女儿在巴基斯坦被印度教徒劫持，他几次前往印度查找她的下落。一次他去印度时遭到逮捕，被指控为间谍投入监狱。他的女儿始终没有回到他身边。

印巴分治的这些方面——家庭如何被拆散，友谊如何越过边

界继续存在，人们如何面对心灵创伤，如何建立新的生活，他们利用了哪些物质和精神上的资源，他们流离失所和伤痕累累的经历怎样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塑造了他们所定居的城市、乡村——所有这些，在白纸黑字的历史书上却鲜有反映。而在一九八四年后，我越来越感到这些方面对我们了解印巴分治是十分必要的。于是我问自己，我必须采用什么方法来开始这项研究，我能够利用哪些“资源”呢？詹姆斯·扬格在写到大屠杀的回忆和证言时，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通过大屠杀得以流传下来的那许多方式，我们怎么可能对它有所了解呢？^① 他的回答是建议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了解大屠杀，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这个问题可以延伸至印巴分治，我们如果不通过这一事件得以流传下来的那些方式——通过小说、回忆录、证言，通过回忆（个人的和集体的）通过它所触发和加剧的教派冲突，以及（只是作为其中一个方面）通过它所创造的历史——如果我们不通过种种这些，怎么可能对它有所了解呢？也许印巴分治与现代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不同，它更多地存在于家史之中，特别是在印度北方，在那里，关于恐怖和兽行、友谊和互助的故事在社区、家庭和个人之间反复传诵。一个旁遮普难民只要一遇见另一个旁遮普难民，立刻就会交流“当年”家庭和国家的一些故事。印度难民碰见巴基斯坦难民，也会进行同样的交流。把这些回忆——个人的和集体的，家族的和历史的——收集起来，便构成了印巴分治的现实。它们揭示了可能被称为这段历史的“底层”的那些方面。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这一事

件。在许多意义上，它们才是这一事件的历史。因此，我决定把注意力转向它们。

这个选择也带来了它自身的一些问题。研究回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没有疑问的事情。我深深意识到我选择的方法会带来的那些问题。已经有大量研究显示，记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或“未经加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忆者是谁，倾诉对象是谁，周围还有哪些人，以及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等等。对我来说，人们选择回忆一个事件、一段历史的方式，至少与那段历史的所谓“事实”同样重要，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实”并非不需证明的、已确定的事实，它们其实也是一些阐释，是这个或那个人回忆或记录下来的。我且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我着手工作时，我遇到的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人们（一开始）都不愿意说话。他们问我：回忆那些事情，把已经忘却的陈年旧事挖掘出来有什么用呢？每当人们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心里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我问自己：为什么人们如此不愿意回忆那个时代？这种不情愿本身肯定也表明着什么。是因为那些事件的性质十分恐怖——它们经过消毒净化后成为历史书中的数字和统计数据——或是，至少在有些例子里，与人们在这段历史中的同谋行为有关吗？在印巴分治中，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有一段在暴行中既是受害者又是进攻者的历史。如果是这样，无疑便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愿公开回忆往事，这段历史的“丑恶”部分被压抑在家庭内部，也许只在亲人之间偶作交流。

我们可能会问，依照詹姆斯·扬格的理论，如果不采用印巴分治得以流传下来的那些方式——不仅要看教科书，还要研究人们的回忆，甚至要洞察人们对回忆的不情愿态度，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怎么可能了解这段历史呢？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所知道那些“事实”就不是无需证明的确定的事实。印巴分治的许多现存历史都是由关于这些“事实”的争议构成的——争议使一个人

一个人的阐释达到平衡——我在这里不打算重复这些争议或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尽管印巴分治是这本书的主题，读者在书中不会看到印巴分治前的大事年表，或分治后的许多“政治”谈判。同样，读者也不会看到这段历史的那些关键人物：甘地、尼赫鲁、佩塔尔·真纳、莱亚·恰特·阿里·汗、蒙巴顿。我有意识地在书中不提及他们。我关注的是那些渺小的、经常是很不起眼的人物：普通人，妇女，儿童，贱民。我主要是通过采访和口头叙述来进行研究的。

我说完这句话，就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充满疑问的区域。口头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异议丛生的领域。我不愿根据我们所称的历史去摆弄人们的叙述或所谓的“原始经验”，因为这两种概念都存在疑问。我不是个历史学家。历史不是我的研究主题。我是通过一种我个人从政治角度对历史的兴趣，通过当代的教族集团主义，以及对女权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来从事这项研究的。所有这些都使我认识到，能够耐心倾听并试图理解宗教分歧如何以及为何具有这样的活力，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印巴分治后的这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虽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了解印巴分治，却逐渐使“我们”和“他们”这两个概念变成其思想方式的一部分？——除了通过家庭和社区的回忆，没有其他。还有，如何理解对记忆的筛选，比如，恐惧和仇恨的感觉似乎受到滋养，获得了更强的活力，而友谊和互助的感情则被压抑着，不让浮出表面？我意识到我所选择的方法伴随着许多陷阱：例如，我们无法弄清人们选择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也无法了解他们埋在心里的那些东西。在事件发生的四五十年之后，我们怎能知道那些故事是否只是经过排练的表演？怎能知道讲给不同的人听的是不是不同的故事，也许是他们揣摩了采访者愿意听到什么后，经过裁减加工的？我们怎样才能越过那些故事，探及他们试图掩盖的沉默？我们怎么能够断定打破沉默、倾诉往事的做法本身是一件

好事？诸如此类的问题多达上百个。但我并非在这里声称自己研究的是口头历史，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严格的历史叙述。我只是想问，人们的故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在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历史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

口头讲述尽管存在局限，但它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一个不同的视点。因为这样的叙述经常临时性地彼此交织，这使严格的时间框架变得多少有些模糊，而历史正是置身于这样的时间框架中的。由于人们定位他们的回忆时用的是不同的日期，或不同的时间框架，而不是标志着历史的开始和结束的那些事件，所以他们的讲述在严格的历史叙述的上下或中间穿梭。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将历史镜头转向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看看这个视角能使我们看到些什么。我在这里不想辩论口头叙述可以取代我们眼中的历史，它们只是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极为重要的视点，我相信这个视点会使历史变得更为丰富。

我逐渐相信，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弄清印巴分治是怎么回事，除非去看一看人们对它的记忆。我不想在这里记一篇流水账，先说看见人们怎样回忆印巴分治的历史，然后试图深入他们的叙述，探究隐藏在下面的事实，以获得近似于某种“真实”的东西。我只是希望研究那些回忆本身——即便它们是移动的、多变的、不可靠的。詹姆斯·扬格说：“幸存者叙述中出现的任何‘虚构’都不是背离真实的，而是以特殊手法描写的‘真实’的一部分。证言的虚构性并不涉及对事实的异议，而是不同的证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在领会和描述这些事实时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差异。”^①关于我希望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没有比这段话表达得更清楚

的了。

有时候，收集材料是撰写一本书最容易的部分。当试图筛选哪些内容可以采用，哪些不予考虑时，就很难作出决定了。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这么多年中，我大约采访了七十多个人。这个数字在我听来十分可观，但是与印巴分治影响到的人数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这表明任何个人都无法对这一课题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这本书的一部分由我讲述的分治故事构成，在其他部分中，则由我所采访的那些人亲口讲述他们的遭遇。但是在我与之交谈的人数中，我只收录了其中一小部分。这并不是说其他人的故事不值得引用，而是因为实际上每个故事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在编撰这本书时很难将它删除。最后，我采用了一种相当任意的判断标准。我收录了那些令我感触最深的故事，那些与我建立了真正友谊的人们故事，或那些令我反复回味的故事。

在把这些采访呈献给读者时，我擅自对它们进行了叙事化处理——也就是说，我删去了采访者的提问，使行文尽可能像一篇连贯的记叙文，不过未做丝毫时间顺序上的改变。在个别情况下，我还保留了其他人的插话，特别是当他们对正文的某些方面有所补充或启迪时。这种把采访内容改造成更具“可读性”文章的做法完全是有意意识的。我认为任何采访的手稿都不可能是一篇未经构思的文章。在把语言变成文字时，已经丢失了许多东西：如特殊的语气变化 在某些观点和语句 甚至感觉上的迟疑不决 吞吞吐吐 还有身体语言——它经常表达了与话语所讲述的不同的故事，以及采访者对采访内容的有意识的“塑造”采访者面对被采访者时 通常是处于支配地位的。鉴于这一点，我认为，伪称采访能以“纯正”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将它们编辑成一种我觉得更加可读的形式。我希望，每次采访的完整文稿，包括我没有在这里采用的那些，都能被收藏在图书馆或档案馆中，供其他人研

究这一领域时使用。

大多数采访都是在家庭环境中进行的，这也意味着妇女跟我们说话时很少单独面对我们。在许多时候，采访不得不在妇女做家务的零星间隙中见缝插针地进行。而且，如果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在场，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接过采访话头，使妇女陷入某种沉默。这种情况并非罕见——许多口头历史学家都写到与妇女说话或交谈非常困难，而且还要学会用不同的方式倾听，经常要捕捉语调间隐晦的细微差别，没有完全说出口的话，以及有时比言语更有表现力的沉默。我认为，倾听妇女说话，在妇女之间的差异比男人与女人的差异更大。

现在重读这些采访时，我吃惊地发现男人与女人的话里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分歧。难道性别不同，对印巴分治就有不同的描述？我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妇女几乎直接把这桩重大事件与她们生活中的小事相联系。从妇女那里我了解到她们生活的细微末节，而男人所谈的大都是教派之间的关系，和广阔的政治现实。男人在接受采访时，很少谈到一个孩子失踪或被杀害，而对妇女来说，这个话题是绝对不能省略的。这个问题我在本书快要结束时还要谈到。

确定与哪些人交谈的过程几乎是很随意的。起初，当我协助两个朋友为英国电视第四频道制作电影《心灵的分割》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找人交谈。一旦这么做了以后，差不多不管找到谁，都能听到一个故事。特别是在德里，你可以肯定，在达到一定年龄的旁遮普人中，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的家里有关于印巴分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自己站在路边跟我认为年龄合适的人谈话。一次，在与德里江普拉的一家人交谈后，我出门找了一辆黄包车拉我回家。车夫穿着巴基斯坦旁遮普人特有的宽松衣服。我问他老家在哪里。他以一个问题作答——当你问印度北方的人老家在哪里时，对方经常会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是问现在还是从前？

“从前”这个词只是一个近似的译法，他实际上说的是：“pichchese”，指的是某种属于过去，已被抛弃的东西。我告诉他，我感兴趣的是他过去的老家，而不是现在的。他说他来自俾路支，印巴分治后在那里继续呆了将近十年，在一个小村庄里，那里一批印度教徒安宁地生活着，没有任何麻烦。很快，我们来到他家，谈起了他对那个时候的回忆。还有一天，当我手里拿着面包和黄油，走出南德里的一家外卖餐厅时，一个女乞丐上来问我要钱。她说着一口旁遮普话，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因为城里很少有旁遮普乞丐。我问她的老家在哪里。她问了我一个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是从前？我用同样的话回答了她，于是她告诉我，她的老家是一个名叫五十三村的小村庄。她随着庞大的“卡非拉”难民潮迁徙过来，绕了几个圈，最后流落在德里街头，靠乞讨过活。就这样，我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从一个故事听到另一个故事，几乎是漫无目的地收集着这些故事。这也是这本书的口头叙述没有任何清楚格局的一个原因。

不过，读者还是能发现一些模式。例如，我引用的许多采访都源自同一个地区——拉瓦尔品第地区，都与当地一九四七年三月（印巴分治几个月前）发生的暴乱有关。为了重建被印巴分治摧毁的社区，人们往往一起迁到某地，或由政府安置到某地。当我开始查访印巴分治见证者时，首先有人向我介绍了住在德里南部中产阶级区的拉瓦尔品第暴乱幸存者。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就这样我收集到了许多故事。因此拉瓦尔品第暴乱幸存者的回忆在本书中占了很大比重。

处理口述资料，除了方法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实际结构方面的困难。一本主要由这些资料构成的书应该怎样编排呢？是否仅仅收录采访内容，要不要加以评论，要不要作分析和/或说明，采访摘录是长是短，等等。这些问题都让我很费脑筋。一开始我觉得最好就是编一本纯粹的口述记录，不加任何说明或评论。后来我改

变了主意：作为读者和出版者，我知道很少有读者会有耐心读完一本口述集，除非这些口述都很短。我觉得我的采访对象讲述的内容非常重要，不能简单地删节，也不能不加评述地罗列在一起。而且我觉得，既然由我来整理采访记录，就应指出这些采访中在我看来有意义的地方。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除了采访对象说的内容之外，我自己还有很多话想说。一方面是他们讲述的故事，一方面是我从这些故事中悟到的东西。我开始考虑如何把二者交织起来。于是就产生了本书现在的结构，采访节录作为分析性章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还存在着如何放置采访全文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我选出的少数采访是应当在书中全文披露的，它们应当是全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过斟酌，我决定把所有采访集中放在书尾。但这样做了之后，还是有同样的问题：会有人认真去读吗，人们会不会把它仅仅看成其他章节的附录？看来很可能会这样。我觉得这些采访太重要了，不能以附录处之。最后，我决定把采访移到正文中，每一章都用一两篇采访对我的论述加以补充。我尽可能使采访内容与章节内容有联系，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要在每章末尾都配上一篇正好反映该章主题的采访是很困难的，不可能那样巧。如果我在开始研究之前就想好了章节的目录，也许可以着意选择与具体题目直接有关的采访。可事实是，我的采访没有任何模式。但我还是决定把采访附在章节中，因为我认为它们能让读者深入了解本书中所有内容甚至更多的内容，而不仅限于它们的所在章节。采访有时放在章节开头，有时放在章节末尾，有一章还以采访作为章节的主线。我想了解这一点对读者阅读这些采访会有所帮助。

采访是我的主要资料来源，但我也翻阅了日记、回忆录、报刊文章和各种我认为重要的文件：不同的人的信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小册子，当然还有书籍。我从这些资料中找到了印巴分治中的许多“声音”：官方的、非官方的、非正式的，等等。其中包括讲述故

事的人的声音 回忆录、日记、自传中的声音 从官方叙述中透出的声音，教族对话中的声音，另外还夹杂着我自己的声音，阅读、议论、询问、猜测、解释。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作为一位作者和解释者的身份是很明显的，有人会说太明显了。我不想为此道歉。对那些似乎作者只是个工具的历史，那些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仿佛是它自己写成的”的历史，我一向抱有很深的怀疑。这种没有“我”的历史也许有助于产生距离感，甚至显得仿佛很客观，很真实。我不想声称我写的这些历史 这些故事 是对印巴分治的“客观”描述。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已经感觉沉浸其中，感情上、政治上和学问上都是如此。要假装这是一个“它自己写成的”历史，那是不诚实的。

在研究印巴分治的历史时，我像所有沉浸进去的研究人员和作者一样，对这一工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好几年中，我脑子里几乎没有别的东西。最让我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的工作中缺少人们所说的客观性。我无法否认个人的介入，无法假装没有感情纠葛，无法抹去我的政治见解。我花了几年才对这一事实感到坦然。如果这本书被当做历史来读，它很可能被扔到门外去。因此也许最好的读法是，在历史前面加上“个人化”一词。彻底地扔掉客观性或距离感的想法。这是一本个人化的历史，它无意伪称客观。

我的声音时常出现在这些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口述的历史在许多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看来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方法。听取妇女们的叙述和证词，把它们和官方的历史论著摆在一起相对照，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由此获得了审视历史的新方法。妇女眼中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它怎样在妇女之间的谈话中，在叙述和证词中展开？然而，口述的历史虽然有用，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讲述毕竟总是单方面的。而且，怎能保证采访对象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构建自己理论的“原材料”呢 在有些情况下，口述历史学家 尤

其是女权主义口述历史学家试图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归于采访对象，以免有利用之嫌。这种做法虽然表明了动机的真诚，却并未怎么改变收集口头证词的行为包含的权力关系：在采访结束后很长时间，采访对象的声音将留在你的作品里，它们可能促进你的事业，对你仍然起着作用，但采访对象本人却日益隐去。这种矛盾总是让人不安，因而我选择了不把自己当成影子，而是把我听到的故事，连同我当时和现在对它们的感受一起放在中心位置。所以，尽管这本书不“仅仅”是讲妇女，但妇女及她们的历史、她们创立的方法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我是以女权主义者的史学研究方法写这本书的。

然而我的书中有一个大的缺陷：它是片面的。它只涉及了印巴分治的一个方面，即旁遮普的分割。对于东部、对于孟加拉我未作研究。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而且孟加拉的分割与旁遮普的情况差别很大，我会觉得无从着手。我也无法收集到巴基斯坦的资料，只有我舅舅的故事（这里有血缘关系）还有我从朋友的著作中引用的一次采访。印巴分治的悲剧之一是，研究南亚次大陆上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人要想获得印巴两国的资料，自己必须属于第三国。否则，不仅档案和文献不容易看到，就是想作采访，痛苦和仇恨的精神负担也使印度人无法就印巴分治采访巴基斯坦人，反过来也一样。我尝试过多次，但都没有成功。

读者在书中看到的这些采访是在几年中完成的。我刚开始采访时，脑子里没有确定的计划：当时并未想到出书，这个想法是后来才形成的。但我很早就决定了采访时不遵循某一种模式——就是说，没有预先定好的问卷，没有按地域、阶层或其他类别而选定的“抽样对象”。我将只是请人们谈谈他们生活中的那段时期，让谈话自然进行，顺其自然。这是一个慎重的决定：要收集印巴分治中人们的生活历史，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这一工作。任何个人的努力（如我的努力）都是有局限的。精心设计的问卷或抽样方法

也不会使它全面多少。所以我决定随采访要求而灵活决定采访形式和对象。就这样我采访了许多人，采访的时间比较长——有时为期几个月，例如对达姆扬提·萨加尔的采访。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单独采访某个人。许多谈话都在家中进行：尽管我们是在采访一个人，但全家人都聚在旁边，有时是一家几代，时不时会有人插嘴解释或主动回答问题。开了头的故事可能被打断，再拾起话头时，可能又讲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谈到那个故事，但也可能永远不再提起。讲述中没有清晰的年代顺序，没有明显的开头和结尾。我开始了解过去是多么容易流入现在的生活，回忆也就是在现在的环境中重新经历往昔。对许多人来说，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八四年相互交融，往往很难分清哪些是他们的回忆：暴力和受害的记忆抹去了间隔的那许多年时光。还有的时候，人们开始回忆，开始在记忆中发掘时，突然会说不下去，因为回想到了某些太痛苦、太可怕，不能讲述出来的事情。“叫我怎么讲呢，”回忆者会痛苦地喊道，“这是说不出来的。”这种时候，我便不再追问下去，不强迫他们把回忆变成语言。于是讲述会在那里中断。我逐渐认识到，过去和现在的交融，讲述的中断甚至前后矛盾，这些都是回忆的一部分。我还认识到口述历史学家经常谈到的此类采访所固有的不平等：大部分时间是我看着，听着，记着，人们向我倾诉他们的生活。当他们反过来问我：你觉得这能有什么用，谁会听你的磁带，这真能对我们的生活、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吗，我立刻感到我的回答很无力。我只能说，我觉得印巴分治的记忆不能丢失，原有的历史忽略了他们的经历和故事，而我是在尝试把这些故事放回到历史中，我认为回忆是忘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我的采访对象会理解吗？这些问题让我很难回答。

关于我写这本书的经过最后再谈一点。开始我是一个人采访。但一段时间之后，就很难继续下去了。我听到的故事太痛苦，

我经常觉得听不下去。我感到那些故事的负担仿佛被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人们一开始不愿意说，可一旦说起来之后，就几乎像是宣泄一样，把心头的重负卸到你这个听众身上。我记得有一天在江普拉一个家庭作完很长的采访出来，我想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不能总听这种暴力和恐怖的故事。这时我的好朋友苏德什·瓦依德加入了进来——在我的请求之下。两个人一起干就好多了，我们可以交谈，分担某些东西，觉得有趣的时候可以说说笑笑。书中有些采访是我们俩合作的——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有些是我开了个头，两人一起做完了的。苏德什后来退出了。主要原因之一是她开始感到再也受不了我们听到的那些故事。那时候我已经很投入，不愿放弃这项工作，便决定独自干下去。我一直遗憾苏德什没有坚持下来：要是她不离开，这本书的内容会更丰富，而且我坚信也会更好，会和现在大不一样。

尽管本书有很多局限，我现在还是把它呈献在读者面前，希望它能对撰写印巴分治的历史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所有人都能有机会接触印巴两方的资料。一九九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庆祝”独立五十周年，当时我想两国纪念这个日子的最好方式是开放边境，哪怕只是短期开放（一年、两年）。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希望到国境“那边”去，看看他们的老家，见见亲属和老朋友。但那个机会过去了：我想我们只能希望有朝一日会多少开放一些，因为除非这样，除非我们能够谈论印巴分治，不然我担心我们永远无法把它抛在忘却。